

■李浙平



还未入夏时，却忽然想起了夏天，便也想到童年。

午后的阳光正旺，吹来的风都掀起阵阵热浪。总有麻雀飞来，落在青瓦上，啄着瓦松。也有一两只飞落在屋前的天井，蹦蹦跳跳，在地面或裂缝处随意地寻食。这些小精灵，不畏阳光的炙烤，显得一副自由的样子。我从厨房间拿个米筛，蹑手蹑脚怕惊了雀，在天井当中，用一段小棒子斜支起米筛，在米筛下撒一小撮米粒，然后将系住小棒子的细麻绳引到廊下。我在廊柱后蹲下，尽量躲开雀儿滴溜溜的小眼睛，捏住绳子的一头。我从廊柱后伸出半边脸，眼珠随雀儿蹦蹦而转动，心里像打着拨浪鼓，只盼着雀儿快点跳到米筛下，好让我捕捉它。寻食的雀儿不停转动小脑袋，只在米筛外面蹦来跳去。但总有一只贪吃的笨雀，发现米粒后，就迅速蹦跳到米筛下，自顾自啄起米粒。我赶紧将手中的绳子一拉，那头系着绳子的小棒子倒了，米筛落下来。可这我只以为的笨雀，却在千钧一发间，从落下的米筛与地面那一点空隙里飞逃了。另外的雀儿也随即都飞起，一阵叽叽喳喳，仿佛在警示同伴，这里寻食不安稳。在厨间的阿妈，看我坐在门槛上，一脸失望相，就笑着说：“吃谷雀儿很灵的。”而我，终于没有用米筛捕到一只雀儿。

黄岩橘很有名气。外婆家原先在东城郭外，有橘园，种植橘树七十多株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年还有收成。农业合作化时，橘园被兼并了。外婆遂在橘园边一小块畦地上，种种豆荚、瓜蔬自用。

夏日正是豆荚成熟时，外婆给我和蕾表妹戴上草帽，一起去摘豆荚。天上没有一片云，白得透亮。我们跟着外婆，过了南河桥里，便要走向田间小路，一直到橘园。河里，一群群游水的麻鸭，很悠闲。无数麻雀在稻田上飞来飞去，叽叽喳喳。热风带着稻子的清香。外婆摘豆荚时，我与蕾表妹钻进畦地边橘树繁枝茂叶的荫下，蹲地上寻蚂蚁。草丛遮住了蚂蚁，没长草的泥地上，却有很多蚂蚁在匆匆爬过。我捉了十来只蚂蚁，装在早就准备的空火柴盒里，要带回家里玩。外婆摘满半竹篮豆荚后，就叫我们回去。到了家，我的屁股开始奇痒，就使劲伸手挠，越挠越痒。外婆见状，将我几个突起的小肿块，原来是被火柴盒里爬出来的蚂蚁叮的。外婆又好气又好笑地讲：“叮起得料。虎姆有介姆好搞”（黄岩方言，意为“叮得这样多。蚂蚁有啥好玩的”），就将火柴盒打开，放在门口，将蚂蚁放生了。外婆拿花露水给我涂抹时，惹来趴在门边看的二哥与众表姐大笑。我的屁股痒了好几天，从此再不敢捉蚂蚁玩了。

过去，居住在城关第四巷大院子里的人家，家家都饲养一两只生蛋鸡或雌鸭。当时第四巷东边有一大片住在附近农民的自留地，被种上了菜。邻居都会到菜地挖蚯蚓喂鸡鸭。我们家养了一只雌鸭后，伯父隔天就拿着小锄头，挖来蚯蚓喂鸭子。我问伯父：“为啥让鸭子吃蚯蚓？”伯父笑着说：“鸭子吃了蚯蚓，长得快，膘肥。”午后的阳光虽然已斜，但在空旷的菜地里，还是能感到太阳照在脸和手臂上，有些儿热辣辣的。种着菜的地里，伯父不去，怕踩坏别人家的菜，只到已割过菜的地里挖蚯蚓。他很小心地刨开泥土，看到了蚯蚓，便弯腰伸手撮起，放进空罐头盒里。我呢，有时候也会伸手从刨开的泥里提起蚯蚓。伯父见我做事，咧开嘴微笑。看看罐头盒里已有三分之一的蚯蚓，伯父就不再挖了，说：“够鸭子吃两天了。咱走吧。”伯父从来不会将空罐头盒装满蚯蚓。他对我说：“别人家的鸡鸭也得吃，留着让别人来挖。”那时起，我就从伯父的言行中，感受到一种知足的快活劲。我跟在伯父后面，往家里回。伯父穿的褂子，后背已被汗水湿透了。

我的童年，有这样的夏日，能不美好吗？我想念我的这些长辈。

夏日

父亲和杨奔老师

■杨国华

杨奔老师在世时，我与他素不相识。他是我父亲在瑞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语文老师，小时候，我经常听父亲讲起他，说他对古文很有研究，诗词造诣也很高，父亲对他很崇拜。

小时候，每当我在灯下写作文时，父亲就说，杨奔老师的文章写得有多好，教出了多少有名的学生。父亲意指他自己也是有名的。其实父亲当时只是乡村学校平阳县后林中心学校的一名普通老师，只是在当地确实很有名。父亲还与我说过，杨奔老师在《浙南日报》（《温州日报》前身）当编辑时，曾有个小学生写文章投稿，经他的鼓励，后来成了一名大作家，那个学生名叫叶永烈。为此，我特别关注叶永烈，读中学时，特意用节省下来的钱，买了他写的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。

我读初中时，不懂语文课本中的古文时，都是父亲教我如何译成现代文，末了，他还会特意加重语气地说：“杨奔老师当年就是这样教我的！”从父亲的话语中，我听得他对杨奔老师是多么崇拜。他还要我把每篇古文都背诵下来，而且要背得滚瓜烂熟，他又说：“这也是杨奔老师要求的！”

父亲后来在平阳萧江中学任教，与杨奔老师的女儿成为同事，由此更增进了与杨奔老师的师生情。有一年的夏天，那时我已是一名海员，回家时，父亲又与我聊起杨奔老师。他说：“杨奔老师又来萧江中学了，这次是特意来找我的！”父亲的意思是，这回杨奔老师不是来看女儿的，而是特意来找他的。父亲当时已五十多岁，说这话时流露出的还是小学生受到老师表扬时的那种兴奋和自豪！

父亲说，炎炎夏日，杨奔老师戴着一顶草帽，脖子上挂着一条白毛巾，穿着白色长袖衫，挑着一担箩筐，里面是他自己种的丝瓜、冬瓜，晃悠悠地到萧江中学。在聊天中，杨奔老师说苍南县还请他去史志办上班，目前正在编《苍



南县志》。父亲当时身体不好，杨奔老师就教父亲怎么养生。父亲说，那天他们聊了很长时间，他要留杨奔老师吃中饭，他怎么也不肯。聊完了，他又挑着箩筐晃悠悠地回去了。父亲摘了些自己种的空心菜放在箩筐里，一直送他到远处的田埂地，直到看不到他背影了才回头。师生情谊，就体现在这些小细节里。

父亲与杨奔老师之间的师生情，还源于杨氏同姓的关系。父亲后来住到温州市区我家里，他告诉我，杨奔老师主编《浙闽杨氏简史》时，还曾打电话给他，叫他参加编辑小组，可惜因身体原因，父亲没能参与。后来，《浙闽杨氏简史》出版了，也是在一个酷暑的夏日，杨奔老师从苍南坐大客车到温州市区，找到我家，给父亲送来该书，并同他聊了很久。我下班回家时，父亲告诉我，杨奔老师刚刚回去，这也让我颇为遗憾。《浙闽杨氏简史》破前人谱牒之惯例，立足浙闽，追本溯源，细节可见杨奔老师编辑之功力。父亲用彩色花纸给这本书包上封皮，并用墨工笔工整地在封面和封底写上“浙闽杨氏简史”，我时常研习，受益匪浅。

如今，杨奔老师和父亲都已故去。我翻阅这本《浙闽杨氏简史》，仿佛又看到那段师生情。父亲当了一辈子老师，一言一行里，都藏着杨奔老师的影子。一段师生缘，一生师生情。

远去的钱包

小时候，总见母亲每晚临睡前把身上的钱包拿出来放到枕头底下，那是一个带拉链的黑色灯芯绒钱包，是母亲亲手缝制的，比很多农村家庭妇女的抽绳棉布钱包精致得多。当时不明白母亲这一习惯，现在想来，那个小小的钱包里，装的可是一家七口的生计。艰难岁月里，掌管家庭财政大权的母亲，也许只有枕着这个“小金库”才能安然入睡吧？

母亲的钱包是有隔层的，里面放着不同面值的钱币，还有粮票、油票、布票之类的票据。每当父亲把工资交给母亲，她就小心翼翼地放进钱包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需要用钱时，她轻轻拉开钱包拉链，指尖捻过纸币，缓缓抽出一张，眼里满是斟酌与盘算的神色。每当我们讨要零花钱时，母亲就打开钱包，掏出一分或两分的硬币递过来，并不忘叮嘱我们不要乱花钱。最叫人欢喜的是过新年时，母亲大方地从钱包里拿出崭新的“大额”钞票分给我们当压岁钱，我们立马感觉自己有了跟邻家小孩“炫富”的底气。那时候，我很羡慕母亲的钱包，经常希望自己也能有个钱包。

哪知实现这一愿望的时间跨度有点大，直到参加工作，我才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钱包。那是一个赭红色人造革折叠带扣钱包，颜色和款式都是我喜欢的，内里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卡位，除了钞票，还可以存放身份证、银行卡之类的小物件。但那时我还没有银行卡，身份证也不常用到，所以钱包就只是单纯地放几张钞票，而我总是习惯把钞票按面额大小依次整齐地叠放在里面，用一目了然。至于这个钱包用了多久，最后何去何从，我已全然不记得。

后来，我买过多个不同材质不同款式的钱包，放在里面的不只钞票，还有各种各样诸如医保卡、银行卡、打折卡之类的小玩意。年复一年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审美情趣也随着提升，我对钱包的喜爱不仅仅停留在它的实用性上，更多时候还在于品质、档次以及由此带来可笑的虚荣心满足。那些年，在一些场合，我们总能见到成功人士优雅地从包里拿出高档钱包完成消费付款，仿佛他们从里面抽出的钞票代表着某种优越的身份认同。

渐渐地，我也把对钱包的追求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未曾预料，时代迅速更迭，智能手机悄然闯入我们的生活，移动支付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而来。当扫码支付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曾经每天出门必带的钱包，一下子成了累赘。不用害怕现金丢失，不必费心准备零钱，只需一部手机在手，对准二维码轻轻一扫，就能轻松搞定所有支付，屏幕弹出的数字替代了纸币使用，简单便捷自不必说。现在，别说大型商场，就是街边小摊，也很少看到有人拿现金支付，就连路边乞讨的流浪汉，也与时俱进在身旁放一张二维码，让好心人扫码施舍。

话说前不久，我乘坐公交车，因出门时看到鞋柜上有两枚面值一元的硬币，心想正好可以当车费，便随手拿过来了。上车时，我很自然地投币，却发现很多乘客同时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，仿佛我是被时代淘汰的另类。尴尬之余，我忍不住想：这是到了不扫码支付就不合情理的地步了吗？

其实岂止乘车，放眼生活各个层面，现金交易明显越来越少。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，生来便身处数字时代，于他们而言，钱包无关三餐四季，无关人间烟火，他们不会将钱包鼓鼓与日子安稳画上等号。而我们这一代人，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变革，也渐渐将曾经贴身携带的钱包抛诸脑后。

细数钱包的前世今生，从风光到落寞，它默默记录着几代人对美好纯粹的生活执念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钱包的远去，是时代进步，但我心里却隐隐有点失落，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留恋。时至今日，我还珍藏着一个用过的钱包，那是旅居国外的妹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若干年以后，这个曾经令我爱不释手的钱包，也会蒙上岁月的风尘，但妹妹递给我时的温度，会一直在。

二舅的苹果与照相机

■孔令周

二舅于我，是新世界的通道。

二舅十七岁参军，据说当年虚报了年龄，身高不够，还偷偷在鞋子里塞了石子。二舅背井离乡，闯出了一片新世界。在外众多的子女中，无疑有着犹如“人仕”的荣光。且不说每年春节发过来的“军属”慰问信，就是大家族聚会时捎回来的“竹叶青”，就足以让大家酒酣耳热、脸泛红光了。

二舅与我母亲，就是他大姐，感情很好，当然这里也有我父亲的原因，我父亲是退伍军人，当年二舅参军，多多少少有受到我父亲的一些影响。二舅每次回来探亲，都会到我家，当然也会带一些小礼物给我们。

小孩对吃的东西总是难忘的。在物质贫瘠的年代，我们会变着法子给自己找一些“零食”，杜鹃花开了，会摘过来把整个花瓣吞下去，茅草旺盛了，把根部挖过来，洗了就是清甜的白茅根，还有屋前房后的蕉芋（老家叫藕芋），叶片大大的，会开出很漂亮的红花，把花萼从基部摘下，吸上一口，就是令人欲罢不能的甜蜜，当然还有各种野果，如覆盆子、地茶果、金樱子……

二舅带回来的是苹果。当时我正上小学三年级，那种绿色的青苹果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，我和弟弟分别得了两个。我很珍惜，爱不释手，圆圆的，大大的，是那种赏心悦目的青绿。那个时候，我早就学过了语文课本里的那篇《小白兔与小灰兔》，当然我要学习小白兔，准备大干一场，要种出苹果树，让树上挂满苹果，可以摘了吃，吃了摘，无穷无尽。这个想法我没有告诉别人，都在秘密中进行，在尝到了那种酸甜之后，愈发强烈了。我把小小的核仁收集起来，埋到了房前的园子里，怕自己忘记方位，还在上面做了标记。我隔三岔五，在上面浇水，盼望着长出苗来。我信心满满，在此之前，我已经有过许多次成功的经验，譬如在牛栏旁种植的那棵桃树，已经高过牛栏的顶棚了，每年结的桃子都吃不完，虽然是那种味道不咋地的野桃，但是这一



图片由AI生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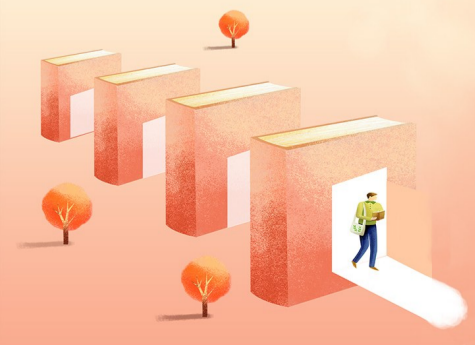
次，却令我失望了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一周、一个月……还是纹丝不动，只是长满了野草。我实在没有耐性了，扒开泥土一看，我的苹果核，早就烂成泥了。我大哭了一场，爷爷安慰我，苹果是北方的水果，在我们这边“水土不服”呢！但在儿时，那棵苹果树，一直在我的梦里摇曳，葱葱郁郁，长满了一树的苹果，如同满天的星光，闪闪烁烁。

有两次，二舅还带来了照相机。这在农村，绝对是稀罕物。乡村里难得来一个摄影师，我最早的一张照片，是周岁的时候，坐在竹椅上，旁边一个大气球，“咔嚓”，摄影师把它定格成黑白永恒。前面，一大片金黄的稻子在阳光里正拔穗弯腰。二舅的照相机，帮我们兄弟俩添加了几张童年照片，弥足珍贵。弟弟有一张在竹林里的照片，手握两根竹子，探出头来，自然天真，眼睛大而明亮，他很喜欢。

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，二舅如同外来的风，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。这在我几年以后，蹲在冬天的稻草垛上，读着《百年孤独》的第一章，有着触电般的共鸣，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来到马孔多，带来了磁铁、望远镜等新奇物品，激发了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对科学和发明的痴迷。

如同站在老屋的中间，一束光柱透过天窗斜射进来，我看见无数的尘埃在光柱里舞蹈，上下，左右，那是飞扬的灵魂……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 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 宣传部
瑞安市委 融媒体中心 宣
瑞安市委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